

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论之一

□ 杨经建 董外平

内容提要 存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所谓边缘性是由其“非理性的僭妄”所致。“非理性的僭妄”源于存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对主流文学“现代性”叙事原则——历史进化说和社会进步论的持疑和质询。从世纪初鲁迅的《野草》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成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立场。这种不合“时”宜性使其只能处于边缘性地位,同时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 存在主义 非理性的僭妄 边缘性

作者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长沙 410081) 董外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已逐渐被学界所认知,^①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存在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探询。^②完全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趋势必然导致作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显学的存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文学的“新”的价值生成点。另一方面,当存在主义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后,已实现了在对本土既有的话语资源整合基础上的东方化重构。问题也许在于,由于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始终处于一种边缘性状态,以至于人们忽视了其作为一种世纪性文学现象的存在。在此,所谓边缘性在其本质上是由其“非理性的僭妄”所致,“非理性的僭妄”正是以下论述的话语前提。

一、历史的“虚无”和文明的“异化”是存在主义的思想特质

如所周知,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是存在主义的思想特质,它集中体现在存在主义对人被传统理性精神或现代文明所“异化”的否定和批判上。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是“因为我们对现代性已无可奈何”^③,所以转而对“理性”和“文明”的怀疑和批判。这也决定了尼采哲学(美学)必然以怀疑主义为起点,又以批判精神为终点,以实现生命本体存在的重建。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尼采的酒神既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这使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艺术批判通过怀疑主义的重估从而生成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后来由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所追随;而哲学的批判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

*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批准号:09YJA751025)的阶段成果。

这是海德格尔所继承的路线。^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则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的普遍形式,并着眼于“自己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从他人对自己的异化角度谈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晚期的海德格尔则主要从“自己与他物”共存关系的角度谈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重点研究人在技术理性时代的异化。而不管是他人对自己的异化还是人在技术时代的异化,都着眼于从个体的人:从“此在”的“烦”的结构和“向死而在”出发去论述存在的历史性,把异化领悟成人的存在的普遍命定形式。相对而言,萨特从物的“匮乏”去追寻异化的根源,试图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化。但他并非像马克思那样把异化看作私有制度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存在于人类始终的普遍而永恒的存在状态。在萨特看来,个体的人在匮乏的环境中首先失去人性然后又起来反抗以求恢复人性。但是反抗或革命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被制度化而重新陷入分散状态和惰性状态,以致丧失人的意志。这样一来反抗或革命也就失去了原来应有的意义,所以,反抗或革命不可能消除异化,相反只能导致新的异化。要言之,当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异化是人的永恒存在状态时,其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便具有了虚无主义质素。

“‘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⑤虚无主义之“虚无”指一种缺失“地基”(传统信念)的世界状况,“缺失”当然是由人之存在的异化所造就;虚无主义更是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态度,即对曾有的生存世界之“地基”的否定。这种“否定”针对的是一种理性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本质论——历史进化论和文明进步论,所以它是一种对历史进化论和文明进步说的虚无。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社会历史发展观上存在主义者几乎都具有反历史进化论和文明进步论的历史“虚无”化乃至恋古、复古的倾向。“要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迷恋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则认为个人所有真正的发展“都是返回到我们的起源”,“存在者,将通过返回到他的起源而试图去认识他自己;在同时,他将反过来展望它的未来而寻求自我认识。这样,他将把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联接在现在里。”^⑥海德

格尔神往的天地神人四维融合的诗意栖居境界实质上与尼采一样——对古希腊文明的回归。在海德格尔那隐晦而诗意的表述中,天地人神的游戏有本真与非本真之分,即他所谓“诗性的”与“非诗性的”之分。在诗性的游戏中,天地人神既是平等独立的又是一体不可分的,在此没有“中心”而只有“中间”,在游戏中确立的真理、意义与价值是诗性的:恰如发生在古希腊人和真正的诗人那里的事情。由此海德格尔便将人以及他赖以生存的真理、意义与价值交给了神秘莫测的存在发生与存在历史,一种类似于希腊神话时代的命运。萨特50、60年代转向了所谓“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中考察并提出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萨特以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警示人们:人生是无意义的,面对荒谬的世界人只能产生“恶心”;即以历史虚无主义试图澄明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以此提醒人们对现存秩序与状态的怀疑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绝对真理信仰的空虚化以及对真理基础的人本化。

二、对历史进步论的质询 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立场

不难发现,对历史进化和社会进步予以怀疑和乃至否定也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立场,众多存在主义作品所体现的“荒诞”和“孤独”主题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审美转述。^⑦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对“原来如此”(《狂人日记》)的民族存在状况和国人生存境遇产生怀疑、否定意识的人。当他决意究察这种存在状况、追问这种生存境遇后,便对自身亦沉沦于此的生存真相有一种形而上的体认,从而表现出人所不及的思维洞察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中间物”,最终“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这样的战士》)怀疑和否定使鲁迅成为一个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称自己的《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⑧当《野草》以昏暗不明、人鬼混杂的地狱意象来象

征存在的境况时,“人”的生存境遇便像一团黑色的阴翳始终无法化解,总是压迫着人的灵魂。从而也使得鲁迅在许多方面接近卡夫卡:“在卡夫卡看来,异化的世界,这是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即没有舵,也没有帆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唯一的世界,而且任何时候,也是唯一的,因为我们不配得到好一些的。”^⑨鲁迅的虚无似乎更彻底。存在主义的“无”是上帝已死去、没有任何绝对客观的价值的“虚无”世界上,人必须自己选择和创造他的价值,个人是各种价值和意义的根源。但是在鲁迅眼中,对于先觉者置身传统中反传统的悲剧性悖论处境的洞察,使他对“自我”亦投去了怀疑和否定的眼光。惟其如此,鲁迅才发出“荷戟独彷徨”的慨叹。于是《野草》时期的鲁迅,在深切的怀疑和自审中无情地剥去了五四以来盲目地加在诸如“大众”、“希望”、“青年”、“黄金世界”等观念上的乐观想象,“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⑩《希望》中的“暗夜”作为一种笼罩性氛围,让昔日满怀信心的个性主义战士们大都陷入绝望的精神状态之中,生存的压力使生命在“暗夜”里异化、变形,以扭曲的方式存在于“虚妄”的社会大环境。于是作者感慨着:所拥有的仅仅是“无物之阵,无词的言语,彷徨于无地”。

如果说世纪初的鲁迅在《野草》中表露出类似于存在主义对历史进步观和社会进化论的质疑和否定,那么这种怀疑和否定意识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不绝如缕,乃至延承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

笔者以为,与其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如说在其创作精神资源的构成上更多受益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现象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破除主客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基本原则是“面向事情本身”,其包含着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胡塞尔认定旧的哲学是不严格的,严格的哲学不能有任何预设和任何假定为前提,因为任何“预设”和“前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偏见”。胡塞尔通过所谓“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悬搁”旧哲学的“信念”和“预设”以确立哲学的严格起点:哲学只从“在直观中原本地呈现出来的东西”^⑪,人们之所以很难进入现象学的视域是因为受制于各种理性预设,即不加彻底考究就接

受了某种现象和事物的现成被给予状态和被给予方式。而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被忽略或含糊了过去。“还原”(Reduktion)意味着去掉一切现成的理性假设从而剥离出一个现象学的态度。海德格尔则把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改造成存在主义哲学的思维基础。当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思路提出问题,不仅“面向事情本身”而且进入人的思维表象领域,并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把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现象学的再度“还原”:不是要还原到超越前的意识始源上去,而是要还原到超越本身——还原到“此在”的生存结构上去。也是通过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从海德格尔到萨特现象学,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并被确立为存在者之存在的追问:“根据现象学原理,那种必须作为事实本身被体验到的东西,是从何处并且如何被确定的?它是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呢,还是在无蔽和遮蔽中的存在者之存在。”^⑫确切地说,海德格尔的现象面对的是“此在”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领域。“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存在论现象学将‘此在’即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引入现象学,而解释则是追寻人的存在意义的重要方法。所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Hermeneutik)’,‘是一种历史学性质的精神科学方法论’。也就是说,‘此在’作为‘此时此地存在着的人’,就显示出了时间性和历史性,它所具有的存在意义就具有了历史的生成性,只有在历史的生成中才能理解一切意识经验。”^⑬

新历史主义小说正是在“面向事情本身”的创作原则上使历史与文学、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在历史的存在空间与人的当下生存境遇之间相互敞开并形成了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学“还原”。如果说这种“还原”意味着去掉一切现成的有关历史的理性假设从而剥离出一个现象学世界,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失却了以往同类小说对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的气度和眼光,因为它还原的是若干并不连续的、通过一些文化碎片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所有这些使得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自身就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或,它悬搁“本质化”、“真理化”的历史——以超越历史本质论的方式得出了有别于“前文本”的历史感观。如格非的《青黄》小说文本在对“青黄”的

词源学考证中逐渐转化为一部关于“青黄”失踪的历史:关于九姓渔户的残缺不全的历史。《青黄》以对历史文本形成过程的虚构性演示来证明真实历史的缺席和不可及。真正的历史过程已淡化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阐释背景。历史的本质性和进步论也陷入困惑之中走向虚无。

“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偶然、不可知、神秘性、文化或命运、纯属个人的冲动、莫名其妙的发迹或死亡等等因素的凸显来宣告历史本身的无理性和不可知性,对理性地把握规律和解放自身的乐观情怀极不信任。在他们看来,人们创造了历史,但人们却为历史所支配且无从解放,从而表达出虚无主义的历史感叹。”¹⁴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分别关涉到三国时期、朱元璋时期、清末和20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等历史时段,而其中的人物却永远不死,杂然共处各个不同的时代空间。这种时间弱化、空间收缩、时间转化为空间的内在逻辑意义,就是尼采式的历史永恒轮回的思想:一个永远重复、永无创新的荒谬的原样世界。

毋庸讳言,“新历史主义小说试图突破历史叙述‘规律—解放’的模式,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的方式,注重描绘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活化而不是将生活历史化。但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怀疑历史理性之时也并未发现思考历史的新方法,因此只能走入虚无的境地——当人无法认识对象时也只能将对象视为本身是不可知的。从本质上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或者必然性永远是认识的两极,本身并无本质差异,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叙述同样面临着合理性的危机。”¹⁵在某种意义上,“合理性的危机”却正是现象学式创作的合理性演绎,其演绎的价值诉求直指对历史进化和文明进步的怀疑和质询,是耶非耶全在乎此。至少可以这么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之类的创作对主流文学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真理观的背离,一方面显示了边缘化创作的执守,另一方面则预示了主流文学有关社会进步、历史进化的现代性叙事逻辑的渐趋淡化。

三、对“现代性”叙事的“非理性的僭妄” 是存在主义边缘性的成因

事实上,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

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界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之所以把“历史观”与“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同等对待,是因为历史总是特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叙述的历史。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

须知,20世纪的文学思潮无一不是对文化现代性的反应。何谓“现代性”?简言之,就是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东西。而在20世纪中国这种可能的东西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亦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旨归。问题还在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往往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于是西方现代性自身那种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差异性、矛盾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世纪初的五四和世纪末的90年代),每每由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使命的紧迫性因而在很长时间内被遮蔽、被忽视而转换成了中、西方和新、旧思想之争。而历史进化和社会进步成为现代性叙事的运思逻辑。这种不断进步和有最终归宿的时间观也包含了西方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

“从启蒙运动发展到今天,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内,‘历史’已经从一个西方的叙事变成了人类的共同叙事。迄今为止,已经没有一个民族生活在‘历史’之外,没有人不是生活在组成‘历史’进程的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国家’之中。……历史这个叙事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依靠它来了解我们自己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历史也是最成功的叙事。”¹⁶启蒙主义者需要为人们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理想目标,来满足人们在传统衰败后寻找共同信仰的精神要求。由此一种带有绝对色彩的信仰和承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它才能担负起鼓励人们投身于伟大的启蒙理想中去。因而使得对于“现代”的追求成为一种面向未来、追求无限的精神上的朝圣运动。在那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将终结,一种完全不同于既有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文明将会出现。它是一种处身于相对主义的时代对绝对主义的渴求。于是启蒙主义关于个人自决、自由伦理、国家主权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都必须通过历史进化和文明进步这种普适性的历史真理来论

证。卡利奈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里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¹⁷黑格尔将现代性定位为“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实现与发展过程，同时他也认为这种“自由”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才能现出“光辉”。¹⁸马克思将现代发展的动力定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也认为理想的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都是通过认识、掌握这种矛盾关系、历史规律来达成的。可见，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诉求如欲获得自身理念与实践的合法性，必须凭藉从奴役到自由、从愚昧到光明的历史化叙事。后者成了现代性确证自身的基点。

而延续了启蒙精神的现代文学理论家们也对历史进化与文明进步这一普适性的真理观情有独钟。巴赫金就认为文学现代性的兴起与艺术“时空体”的变迁有关。他指出不同观念的人们通过不同的时间、空间组合体来理解并叙说外部现实，古代人从奇迹、巧合与偶然性的角度理解现实所以需要空间性小说来表述，现代人从合目的性、历史必然律去观察现实，所以需要时间性小说来表述。空间性体现在早期流浪汉小说、漫游小说、传记小说与田园诗等体裁中，它们不从时间动态发展而“从空间角度，从静态角度来看五彩缤纷的世界”，¹⁹这类小说显然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人性逐步完善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性设想。于是，在教育小说与成长小说中出现了从空间向时间的转型，它不再是静止的而是包含着交替与更新而“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这种变化标志着历史时间对叙事的进入。历史渗入叙事以后，人物与社会便“在意义上失去一成不变的性质：它的内涵和意义会随着环境的进一步展开而更新和发展。”²⁰它直接导致历史的价值意义在文学叙事中的全面建构。巴赫金所表明的是，现代性之所以能在文学中得以表达是以现代时间观念对叙事的渗透为前提的。这种时间性不仅使文学中的经验与事件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发展状态，同时还某种黑格尔或马克思式历史因果律赋予个人和族群，使之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并与

特定的历史本质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纠缠发生紧密的关联。此即斯宾格勒所言的“极端历史主义的”现代人需要的一种能处理“整个生活”的文学形式。²¹“由于‘进化’是一种‘科学公理’，因而社会和个人的进化不过是‘公理’的物质性的展现。进化的观念提供了社会走向未来的动力、目标，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在中国发生的理论依据。”²²亦即，启蒙精神及其对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也是以五四为肇始的中国“新文学”兴起的内在动力。

实际上，“历史意识”和“现代性”问题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不是局外的问题而是关乎文化（价值）现代化的问题：只有通过文化（价值）的现代化创造才有可能进入现代性，也惟有为一个时代设置真理的尺度那个时代才具有文化（价值）的含义，因而才富有历史性。而这里所说的历史性相对于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而言就是所需要的“现代性”。在更大范围内，乃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被破坏的历史境遇所造成的，而与此历史境遇相关的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重构并未具有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文化态势，更谈不上类似于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高于古代文明的意义和价值重构。因为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并不存在西方的古代（希腊）—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近代文化）那样完整的文明链，相反，面对的恰恰是文化和历史的断裂。为此不得不凭借历史哲学干预历史的“文明化”。卢卡奇曾将文学视为历史哲学的形式：“这不仅因为小说规范的不完整性和问题性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形式，而且，其形式的基础已经触及时代精神的真实状况，从而成为拥有合法性的标志”。²³执意追求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哲学的表现形式，因为“历史情状所负载的一切分歧和破裂必须被放置到赋形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也不应用写作手段伪饰起来。”²⁴

中国现代性过程一开始就是以“现代”与“传统”的分裂为表征——从“创世”或“进化”开始，“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²⁵文明进化与历史进步的问题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更已成为一个逼人正视、令人振起而行动的世纪性话题。五四时李大

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相信个人凭着无限的意志力,不但可以进入“无尽青春”而且整个民族、世界、宇宙同样如此。李氏声称苏联“十月革命”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纪元”或“复活更生”。当他以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与乌托邦的心态欢呼 and 迎接“十月革命”时,有理由相信这是有关“现代性”叙事的先声。其时胡适也揭示并预言,“文学革命”亦即“文学进化”,其《留学日记》(1916年4月5日)中这样说:“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可也’。”因此中国文学的发展既可说是进化史,又可以说是革命史。胡适的《逼上梁山》一文中就用这个观念去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从此以后,我觉得我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文学叙事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为思考对象来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由此对文学中历史与人、历史与审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做出系统的说明,因此历史叙事也包含着一个对各种文学话语进行内在整合的审美诉求。文化的进化观因此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论。这意味着,进化观在现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又往往与“科学”、“进步”、“革命”重合在一起,而社会“革命”无疑是历史“进化”的特殊的形式。“现代性的态度之一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它把个人及其生存的意义与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的当代时刻相关联,置身于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²⁸客观地说,这是一种带有权力话语特征的总体化叙事——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呈示在主流文学的叙事逻辑中。

质言之,五四新文化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规划中去,它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建构文化自身历史的开始,文学也因此被“历史化”了。文学创作原本就是文化话语体系中最活跃、最具表现力的话语形式,因而文学叙事更能使人看到有关现代性总体化叙事的本色。反映在文学观念方面,则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理念来把握创作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尤其是当中国的现代性发展选择了激进的革命方向时,激进的革命与传统社会实行决裂的同时也与西方式现代性

实行决裂。这种双重决裂使它必须重构自身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从30年代的“革命文学”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均以社会历史的进步为运行逻辑,以再现客观历史为艺术原则,通过建立历史元叙事的方式赋予文学完整的历史观。即,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建构完整的叙事时空结构,为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找到充足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依据。

总之,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依凭一种具有历史终极目的或形而上意义及其变化着的可能性——“历史必然性”或“历史的规律”。主流文学创作的形式和结构因此也与特定的“历史”叙事形式和表述结构具有同源性关系,它遵循一整套的历史观念为基础建构它的审美观念和叙事法则,并在文学创作中被审美转述为宏大的社会解放主题和历史进步的真理。可以说,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创作精神轨迹其实正是中国现代性叙事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有关历史“虚无化”和文明“非理性”的叙事原则与主流文学的不合乎逻辑的取向,注定了其不合“时”宜性——一种命定的边缘性地位。黑格尔所谓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边缘性”正是这种合理的现存。

注释:

①参阅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

②⑦参阅拙作:《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现象学式书写:20世纪晚期小说的一种存在主义创作倾向》,《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③④转引自[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9、113页。

⑤[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⑥转引自朱立立:《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⑧鲁迅:《野草》英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苏]扎东斯基:《卡夫卡和现代主义》,洪天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1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

试论原型理论的文学解释力

——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

□ 俞 苑

内容提要 本文以藏族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崇拜原型为例,分析探讨原型理论解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的局限,并根据艺术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源问题的探究,不能脱离具体作品及其产生的文化情境。

关键词 原型理论 解释力 藏族民间文学 动物崇拜

作者俞苑,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当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日益凸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时候,荣格的原型理论是否仍然具有某种层面的解释力,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文学心理学议题。本文对于荣格原型理论解释力的评判,将主要以藏族民间文学作品中动物崇拜原型为例。即从民间文学中普遍叙述的人类对于动物的崇拜和信仰层面,来分析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和运用原型理论的可能性,并结合艺术人类学专业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力图给予荣格的原型理论一种更为客观的质疑方式和评价。

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心理学”(psychology of literature)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但是往往还有很多人会从文学作品的起因来尝试评价文学作品,即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作家当作一种类型和个体来研究,或进行创作过程的研究。这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是并不值得提倡的“起因谬说”。^①因此,本文首先想指出的,就是荣格的原型

印书馆 1992年版,第84页。

12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1255~1256页。

13 曾繁仁:《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4 15 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16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第10~14页。

17 [美]卡利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18页。

1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1年版,第503页。

19 20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216第18、29、534页。

21 参阅[美]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2年版,第16页。

22 2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1024~1025、1033页。

23 24 [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8、36页。

25 [美]余英时:《中国近代史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责任编辑 尹 之

Keywords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False Silver Circulation the County Dealing with Expiration

Th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to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97)

Gong Yun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research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experience a variational process: researching attitude from despising to recognition, selecting objects from out-of-order to designedly, and coming forth some nonesuch production such as Emendation for Dream Stream Essays and Past Dynasties notes Summarization. But these researches don't meet for the study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cies in compilation quantity, quality and searches. It'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coordinat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compiling Compilation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the studying theory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Keywords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103)

Meng Hongdang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00)

Abstract Understanding self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human beings, and thus conceptions of self have been the key sub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human beings, the influence of work and possessions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self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theme that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Keywords Self Conception, Metaphor

The “Nihilism” of History and the “Non-Rationality” of Civilization—On the Marginality of the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 (Part One)

(108)

Yang Jingjian, Dong Waping (Literature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fact was a kind of centurial ideological trend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hile it always was at the marginal condition which resulted from “non-rational offensive”. The non-rational offensive originated in the suspicion spirits and denial consciousnesses of the existentialism. It suspected the “Modernity” of the ideals of historic evolu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Lu Xun's Wreeds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o the new historicism novels in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nihilism” of history and the “non-rationality” of the civilization became a basic creation standpoint of the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ecause of unsuitable for that time, it had to be on the edge,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ed its unique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The 20th Century China Literature, Existentialism, Non-Rational Offensive, Marginality

The Explainable Extent of the Archetypes in Folklore Study

—Use the Animal Worship Archetype in Tibetan Folklore as An Example

(114)

Yu Yu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sis the limitation of the Archetypes in Chinese Minority folklores' study. It also uses the Art Anthropology as a main method, and the animal worship archetype in Tibetan folklore as an example to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Minority folklore studies should not leave the cultural situation research. It is useless to discuss the essential problem without knowing the certain cultural circumstance.

Keywords Explainable Extent, Archetypes, Animal Worship, Tibetan Folklore